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南昌起义史论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南昌起义史论

张月琴 主编

白冰 张月琴 编写
张家英 凌家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1071839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南昌起义史论

张月琴 主编
白冰 张月琴 编写
张家英 凌家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行政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9万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70

统一书号: 11110·41 定价: 1.30元

前 言

南昌起义是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历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壮举。关于南昌起义的著作和文章虽然已经出了不少，但前此还没有一本有关这一专题的史论性著作。我们因为工作关系，长时期比较多地接触了有关南昌起义的史料，并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过一些粗浅的探讨，因之壮着胆子将我们的探讨成果整理成此书。

本书基本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南昌起义的酝酿决定一直写到井冈山两军会师。有些部分由于资料充实，可能写得详尽；有些部分由于资料掌握不足，可能写得比较简略。毋用讳言，我们所见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研究又不深透，无论叙还是论，肯定存在极多不当以至错误；我们之所以把自己尚不十分成熟的观点奉献给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同仁，主要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对南昌起义深入探讨的兴趣，并求得对我们的批评和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南昌起义研究的若干成果，在此对那些使我们受到教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书中也列举了一些我们所不同意的观点，主要为的是方便讨

论，在此特向有关同志致谦。

本书的提纲是由参加编写的人员共同拟定的，参加编写的有白冰、张英南、张月琴、凌家传（按姓氏笔划顺序），由张月琴担任主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三易其稿。张月琴编写了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白冰编写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第三、四节；张英南编写了第四章，由张月琴作了重大修改；凌家传编写了第五章，由张月琴进行了修改。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武装起义 挽救革命

第一节 武装起义的酝酿

东征讨蒋（ 3 ） 中共中央改组（ 14 ） 党中央
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16 ） 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策
略的时间（ 21 ）

第二节 南昌起义的提出和决定

南昌起义的提出（ 25 ） 所谓“庐山会议”（ 27 ）
第二次九江会议（ 30 ） 小划子会议（ 31 ）
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35 ） 周恩来到九江和第
三次九江会议（ 37 ）

第二章 南昌起义的爆发

第一节 起义的准备

各方力量汇集南昌（ 43 ） 战前准备（ 46 ）
与张国焘的争论（ 50 ） 战斗部署（ 55 ）
朱德“请客”（ 60 ）

第二节 起义战斗打响

起义的口令和打响的时间（ 63 ） 首先打响的地
点（ 64 ） 起义战斗的胜利（ 69 ）

第三节 胜利之后

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73 ） 整编军队（ 76 ）
关于几个文告（ 79 ） 起义后与各方面的联系（ 86 ）

第三章 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 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节 诞生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工作的历史回顾（ 88 ） 陈独秀
的错误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造成的危害（ 93 ）
中国共产党内要不要武装斗争的争论日益尖锐（ 95 ）
南昌起义诞生了人民的军队（ 98 ）

第二节 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土地问题的认识过程（ 103 ） 共产
国际的推动和“五大”前后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 108 ）
南昌起义的根本纲领是土地革命（ 112 ） 对土地革命
的开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115 ）

第三节 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尝试

明确提出独立领导建立根据地（ 118 ） 驳所谓“城市
中心论”（ 120 ）

第四节 实行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策略 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教训（ 124 ） 新的统一战线策
略尝试（ 128 ）

第四章 起义军挺进广东

第一节 从容撤离南昌

武汉政府方面的部署（133） 南京政府方面的部署（137）

第二节 从南昌到抚州

南进路线的确定（139） 从南昌到抚州（140）

蔡廷锴部的叛离（142） 初步整顿（143）

第三节 从抚州到瑞金

从抚州到瑞金（145） 会昌战斗（147） 重返瑞

金（151） 贺龙入党（156）

第四节 转进福建

南京反动集团的新部署（161） 起义军在长汀（162）

起义军在上杭（164）

第五节 潮、汕受挫

直趋潮（州）、汕（头）（167） 主力受挫（170）

张太雷到汕头（174） 流沙会议及主力挫败（178）

激战三河坝（182） 潮、汕失利的原因（183）

第五章 艰苦转战，南昌起义余部开始了 战略转变

第一节 艰苦转战

突出重围，保存实力（187） 天心圩、大庾整军（189）

上堡整训（192） 开始解决“立足点”问题（196）

与范石生的合作（198） 待机犁埠头（200）

脱离范石生部（202）

第二节 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的决定和发动（206） 湘南暴动的高涨（212）

湘南暴动中分配土地的斗争（216） 湘南暴动的成果

未能巩固的原因(217)

第三节 两军会师及其意义

两军会师(219) 两军会师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220) 游击战争策略原则的应用和发展(223)

引 言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日趋紧张，在蒋介石集团叛变后曾一度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党也逐渐暴露了反动面目，以种种借口镇压工农运动。由于当时在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中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占了统治地位，在国民党反动派新的进攻面前，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遭到惨败。

革命失败，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从此开始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勇敢尝试。南昌起义，正是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开端。

第一章

武装起义 挽救革命

第一节 武装起义的酝酿

中共中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不是突发的。在此之前，已原则上决定以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宁、汉反动政府^①，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斗争。那么，这个武装起义动议的提出，经历了怎样一个审时度势的酝酿过程呢？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生反动军官许克祥的叛变事件（即“马日事变”）到六月底，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虽然继续声称将召集正式会议，“来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已经在镇压工农运动，进行反共反革命勾当。在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面临最终失败之际，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阵营内要求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以及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积极行动，力图挽救革命。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一再贻误挽救革命的时

^①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七·一五”汪精卫亦走向反动，使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由于蒋、汪所代表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分设在南京（宁）、武汉（汉）的两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仍处于对峙状态。

机，致使革命势力最强大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工农革命力量损失殆尽；而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也主要限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的一部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认识到，争取和依靠那些仍然倾向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坚持继续与反动派抗争并发展革命的重要手段，因而开始进行争取一部分国民革命军左派将领如张发奎等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武汉政府再度酝酿东征南京，讨伐蒋介石。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以张发奎部为依托，离开武汉，另谋发展的机会。

东 征 讨 蒋

东征讨蒋，与武装起义问题的提出有着密切关系。

东征讨蒋，作为武汉政府的行动口号，曾经几次被提出过：最初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提出，即蒋介石公开叛变前夕。那时，上海被夺得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工人纠察队控制，南京则由倾向革命阵营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驻防，而蒋介石为建立反革命统治的立足点，正积极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倾注全力准备夺取这两大都市，并将嫡系部队摆布在南京、上海一线，盘马弯弓，跃跃欲试。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叛变活动，共产党员吴玉章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起主导作用的国民党中央，便准备把刚由江西前线到首府武汉的北伐军主力第四军调往南京方面，加强防御，呼应上海革命势力，监视和遏制蒋介石。四月三日，第四军完成了东进的一切准备，并决定于四日出发。就在这时，有人因担心东征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导致蒋介石扣留刚从国外抵达上海的汪精卫，使其不能前往武汉，而反对第四军出师，这一计划便被搁置下来。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武汉政府管辖下的各省掀起了广泛的反蒋怒潮，共产党内外要求东征的呼声又起。面对叛变的蒋介石和已经进兵河南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是先东征，还是先北伐的问题遂成为武汉阵营领导集团的议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主张东征占领南京，然后沿陇海路北上进击

奉军^①；正在上海的周恩来、李立三等提出应趁蒋介石在南京上海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②；但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陈独秀却急于进兵河南，接应国民军领袖冯玉祥出潼关，以便打通所谓“国际路线”^③；四月初就和蒋介石达成反共协议的汪精卫这时再次和蒋介石集团的密使暗中勾结，议定承认蒋介石叛变的既成事实，大家分途北伐，待会师北京后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因而他也极力主张先出兵北伐河南^④。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先行北伐河南。四月十九日，北伐军在武昌誓师进兵河南，“东征”之说再次成为泡影。

六月一日，北伐军与国民军会师郑州。十日，武汉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首领，避开共产党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谈，达成协议。之后，北伐军班师回汉，唐生智等立即在本部大肆“清共”，在两湖一带残酷镇压工农，朱培德亦在江西通电全省一致反共；汪精卫等假“左”派首领则与反动军事将领紧密配合，盗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训令，限制和打击革命运动，支持叛乱。但是，另一方面，汪精卫、唐生智之流为了继续利用共产党的威望和仍然表示容纳共产党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力量，与蒋介石争夺“党统”地位，又大耍两面派手法，并不正式提出反共号召。而陈独秀因为幻想保住统一战线，打击蒋介石，竟对汪精卫、唐生智百般应奉，步步退让。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武汉政府第三度提出东征讨蒋的动议。叶挺在一九二七年写给中央的报告《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中就说过：“及至河南战争幸获胜利，但冯玉祥得与蒋介石联合，而反对武汉政府。此时武汉政府益趋险恶，两党的分裂已成万不能免之势。但我们仍是让步，保持合作，并没有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②周恩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③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④《李宗仁回忆录》。

坚决的作进攻的准备”。“此时武汉政府的策略是‘分共’、‘讨蒋’，分共已实现了，遂去进行讨蒋”。

如果说过去“东征讨蒋”曾经作为一项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战略决策被武汉政府提倡，那么现在它只不过是汪精卫、唐生智等用来蛊惑人心、排除异己、谋求私利的手段。正如陈毅后来在回忆南昌起义时所指出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性质，实际上和蒋介石已经没有区别，一样的杀共产党，一样的捣毁农民协会，一样的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征讨蒋的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发表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保持一定的欺骗。事实上，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①对于这次东征讨蒋，武汉阵营中不同的人和政治集团，是各怀不同打算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一贯明争暗斗，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争夺对国民党的控制权，进而夺得全国的统治权。但汪精卫因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便极力拉拢和依靠掌握兵权的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共同倒蒋，以实现自己的野心。那么，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能不能为汪精卫所用呢？

先看朱培德。朱培德原属随李烈钧出广东的滇军张开儒旧部，后偏促于粤北乐昌一带。经驻粤滇军内部几度争战后，朱培德投向孙中山，先后受编为大本营拱卫军、直辖第一军、建国第一军，直到一九二五年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时，也只拥有一个师两个旅三个团的番号，全部实力不到三千人。由于朱培德表示愿意靠拢革命，以滇军总司令的名义，率所部被编入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序列，趁机开进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与之有关系的各地方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培德部被编为第三军，辖三个师九个团。在北伐大军誓师之前，第三军即有五个步兵团尾随第四军向

^①陈毅：《南昌起义》。

湖南出发，未参加过重大战斗，北进直达醴陵。武昌合围后，集结在湘赣边境的各部向江西攻击前进，第三军为中路，追击到江西的新余后，始与军阀邓如琢部主力接触。北伐军经过几次战斗，扫除了南昌一带之敌，朱培德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进驻南昌。此后，他积极招募新兵，收编北洋军阀旧部，扩充实力。原投靠北洋军阀的滇军旧部杨如轩、杨池生就是这时投到朱培德门下的；在湘西苟延残喘的金汉鼎也带领残兵败将投奔而来。一九二七年初，在蒋介石阴谋叛变、革命与反革命营垒斗争激烈的时候，朱培德一面直接参与蒋介石集团的活动，一面表示拥戴武汉政府。三月间，武汉政府明令朱培德部下王均第七师负责管理南昌卫戍事宜，不久又任命朱培德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而四月蒋介石于叛变之后，也发表朱培德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样，朱培德就脚踏两边船，获得了在江西扎根的合法地位。在宁汉公开对立的情势下，由于江西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两湖和江浙两个营垒之间，朱培德为保住自己已得地盘，一方面在五月初即公开宣布“欢送共产党”出江西，并着手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向蒋介石集团显示反共姿态；另一方面仍然与武汉方面保持联系，继续“拥护”武汉政府，对于宁、汉两方面始终保持不即不离态度。因此，对于东征讨蒋，朱培德表面上虽然赞成，但在胜负难定的时候是决不会积极参与的。

唐生智对于这一次东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在两次北伐中，唐生智是国民革命军将领中最显赫的暴发户。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唐生智以湖南省防军一个师长的身份，支持进步势力驱逐省长赵恒惕的运动，后来成为代理湖南省长，所部因而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叶开鑫师的进攻并濒临绝境。只是由于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的奋力援救，才免于覆灭。在投向国民政府后，唐生智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第一次北伐中，唐生智不仅巧妙地保存了实力，而且将部队迅速扩充为八、三十五、三十六等三个军，一跃而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并进而取得指挥武汉政府属下全部军力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成为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的

主脑人物，一度独霸武汉政坛。在四月份武汉政府准备调兵东下时，唐生智虑及自己在两湖立足未稳，对讨蒋持不积极态度；对于第二期北伐也同样不积极，并默许部下何健、许克祥等在湖南对革命武装发动试探性进攻；但又怕工农趁其主力不在武汉、后方空虚之机，起而夺权，便常常公开发表“左”倾言论，表示革命，迷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待到六月中旬所部班师回汉，两湖已成白色恐怖世界后，他自觉时机已到，便在所部大肆清除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稳定”了对两湖的统治。为继续扩张地盘，进而争霸天下计，他开始觊觎长江下游的富庶之地，急于打击蒋介石并取而代之。但与蒋介石相比，唐生智显得势单力薄。所以，他力主在武汉政府的旗帜之下发动东征，以图驱使武汉政府属下的全部军力为实现其个人野心冲锋陷阵。

此外，唐生智把进行此次东征视为排挤、打击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而战斗力又较强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良机。在当时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就曾有一篇评论说：“第二次北伐时，唐生智对于共党有关系之军队，既已步步提防，餉械两项格外慎重，故领得七十万现金，仅予以五万余元；领得四百万子弹，仅予以七万。临颖战役，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以与共党有关之军队参加正面作战，致彼损失八千多之士兵；唐生智由豫返汉赴湘，即来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及排斥共产党；冯玉祥由徐返豫，亦有此同样要求。不久，而共党中央决议案发现，武汉中央党部乃通过分共之主张，并定一月之内，召集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一切纠纷，而对于在赣之共党军队（即第二十军贺龙及第十一军叶挺一师），亦有根本解决之计划，即以东征为号召，以贺叶军队担任中路前锋；左路唐生智之第三十五军沿长江西岸前行，三十六军更紧随其后；右路为程潜之第六军及十三军；朱培德所部则在赣南集中，为断彼回粤之计。在以左右两翼之力量，压迫去打硬仗。如胜利，则令其开赴江北，且餉械不予接济，则彼必归于自然消灭之一途。”^①显然，在唐生智、

^①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朱培德两边挟持下，不论东征胜与负，其结果都“必然使二方面军走到一个极危险的地位，势孤力尽，至生无容身之地，死无葬身之所。”^①可见，老谋深算的唐生智用心十分歹毒。

张发奎并不是傻瓜，对于唐生智的用心看得一清二楚。张发奎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组建时，他担任第四军独立旅旅长，参加了统一广东的战争后，升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北伐大军出师前，张发奎率部由广东琼崖北上湖南，在攻占醴陵、浏阳、长沙、平江等各次战斗中，屡立战功；在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攻坚战大获全胜后，张发奎声誉大震。一九二七年初，第十二师从江西战场回师武汉，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一九二七年春，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脱离武汉政府投奔蒋介石，张发奎因积极赞成反蒋一度兼任第十一军军长。二次北伐班师后，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二十军，统师近四万大军，成为武汉政府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虽为旧军人，但由于广大共产党员在其部队中充分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客观上为他的迅速升迁创造了条件，因而十分赞赏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并任用共产党员带兵，如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刘鸣霞、梁秉枢、范荇、彭铭、侯镜如、周邦采、傅维钰等都先后担任握有重兵之权的师、团级军官，这在其他各方面军中是没有先例的；至于营、连级军官及主要的政工、参谋人员，所用共产党员就更多了。此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是著名的革命将领，并且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他热诚欢迎共产党员周逸群等帮助整顿部队，大量接受因反动派迫害而面临危险的“红帽子”的“左倾”举动，也是人所共知的。对这些，张发奎也没有予以限制。鉴于上述种种，“分共”显然只会削弱张发奎部的军力，因而他迟迟难下决心，在六月间唐生智、朱培德大力“分共”、迫害共产党人之际，

^①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